



陶鲁笏 著

毛主席教我们 当省委书记

I 251
104

95470

毛主席 教我们当 省委书记

陶鲁笏 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

毛主席教我们当省委书记

著 者/陶鲁笏

责任编辑/王春明

封面设计/谭德山

版式设计/郑 刚

出版发行/中央文献出版社

经 销/新华书店

排 版/北京地质印刷厂

印 刷/北京博诚印刷厂

850×1168mm 32开 6.5印张 170千字

1996年8月第1版 1996年11月第2次印刷

印 数 5001—8000册

ISBN 7-5073-0327-6/K·113 定价: 15.00元

自序

1993年12月，我曾把1990年以后自己在报刊发表的回忆毛主席的文章，辑成一册，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一个省委书记回忆毛主席》，作为一瓣心香，献给毛主席百年华诞，聊寄对老人家深深的怀念。

现在，我把近两年新写的文章收集起来，又将前书中的文章做了些重要修改，编辑到一起，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这里主要是回忆当年毛主席怎样耳提面命、言传身教地教导我们当好省委书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因此，以开卷篇《毛主席教我们当省委书记》的题目做书名，当会更准确、鲜明地反映全书的主题。

毛主席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战略家和实践家，他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国情相结合，和他的战友们一道，创立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他领导中国共产党和全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又不停顿地投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探索中。在这光辉的战斗历程中，取得过伟大胜利，也经受过失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那样严重的失败。对于毛主席在建国后的功过是非，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已经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我是完全拥护的。

*毛泽东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所创立的具有世界意义的历史

功勋，是谁也抹煞不掉的。毛泽东作为一位历史伟人，他属于中国、属于世界；毛泽东思想作为人类的精神财富，在他生前属于中国、属于世界，在他身后，仍然属于中国、属于世界。

人们深情地思念毛主席。越来越多的人，把怀念和敬仰之情，变成学习毛泽东、研究毛泽东的热情和积极性，在中国、在世界，正出现一个研究毛泽东的热潮。在我国毛泽东研究的科学园地里，更是一片百花争艳的喜人景象。不仅有许多专家学者、专业人员，从事专门研究，而且越来越多的普通干部、工人、农民，特别是青年学生，纷纷加入研究毛泽东的行列。他们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不同层次，对毛泽东进行全方位的深入研究。这体现了我国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思想活跃、学术空气浓厚，学术研究趋势日益繁荣。遵循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开展学术研究，人们在某个问题或某个方面得出相同或不同的结论是正常的，学术观点的多样性，是应当允许而无需大惊小怪的。要求学术研究的结论千篇一律，只能使人们思想僵化，不利于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凡能冠以“科学”的研究，必须根据真实有据的史料，而不能人云亦云，更不能依据以讹传讹的道听途说。因此，重要的是掌握真实可靠的史料。正是为了帮助人们做到这一点，把我同毛主席接触的往事，一一回忆起来，写成文章，编成书，献给读者。

吾生也晚。我没有跟随毛主席爬雪山、过草地。1936年，在石家庄入党后，我就盼着去延安面聆毛主席教诲，因工作原因未能如愿。八年抗战、三年解放战争，我一直在太行山根据地工作，没有机会去延安，夙愿也没能实现。直到1949年4月，我作为太行区党委书记，去北平香山“双清别墅”向毛泽东汇

报工作，才第一次见到毛主席。那年我 32 岁。从 1953 年 1 月到 1965 年 8 月，我担任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期间，我有幸直接接触毛主席不下 40 次，参加毛主席主持的小型会议就有 20 多次，同桌进餐也有八九次。最难忘的是 1957 年夏季参加青岛会议那次。会议结束时，山东省委宴请与会同志。我因事迟到了，走进餐厅时，除中央领导同志那桌还有空座外，其余餐桌均已座无虚席。我一眼看到，周总理在招呼我，我便坐到他身边。一会儿，毛主席来了，正好坐在我右边。他似乎发现我有些紧张，就边说笑，边为我夹菜。在两位伟人之间吃的这顿饭，那种既兴奋又拘谨的心态，仿佛就是昨天的事。回想起来，这十多年的历程和机遇是我一生中最幸运、最难忘的美好时光。

毛主席逝世以后，当年那些最美好的记忆化做汇聚心头、无法排遣的不尽思念。

1990 年以后，我陆续把这绵绵思念一段段理出来，述诸笔端，整理成回忆文章。但我并非对往事简单追述。我像学生咀嚼、消化老师讲过的课那样，对往事的每个细节，都认真的再思考、再体会，并努力把自己的新感悟、新体会，表述到文章里。收入本书的文章，除《毛主席畅谈四面八方》是属于新民主主义时期的以外，都是属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所有的这些文章，主要是依据我听毛主席谈话、讲话的个人笔录整理而成的。

本书在时间上涵盖的历史跨度是 1953 年 1 月到 1965 年 8 月这 12 年零 8 个月。按内容，可分三类：第一类是毛主席言传身教，生动地体现的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群众路线、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等优良传统，和他那

独特、卓越的领导方法、工作作风与学风、文风。我尽量通过描述具体事例，使读者从中得到具体的感受。第二类是毛主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试验与探索中，总结实践经验，创造性地提出的新观点、新思路。现在看来，当年毛主席是要探索一条不照搬苏联模式而又胜于苏联的中国型的社会主义道路的，但客观实际不以人的主观愿望为转移，在探索过程中，经历了曲折与失误。如何看待这些曲折和失误？我认为，科学的态度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因为这段历史中我们经历了曲折与失误，就把一切都看得漆黑一团，一无是处。应当看到，在那段历史中，还是有一些闪光的东西值得珍视的，它们对于今天的中国和明天的中国还是有益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同志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尔后又总结了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使之上升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继承、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创立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本书正是想通过历史回顾，使人们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理解有所帮助。

书中第三类文章涉及至今仍有争议、评说不一的历史问题。我依据十多年间的现场笔录和山西省委保存的档案，力图把毛主席当年讲到这些事件和问题的话，如实地记录下来，重现这些历史事件和有争议问题的本来面目。

这本小书，若能给研究毛泽东提供一些可资参考的真实史料，我就很满意了。当然，即使是史料性的文章，也不能不反映作者的观点，而我所了解的情况和对问题的认识，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和个人思想水平所限，难免有缺点和错误。我诚恳地期望读者批评指正。

目 录

自序	(1)
毛主席教我们当省委书记	(1)
调查研究中的言传身教	(23)
“用心寻找当地群众中的先进经验”	(32)
干部参加劳动是百年大计	(37)
“第一书记要心挂两头、三头”	(47)
必须利用商品生产和价值法则	(54)
最好的学习是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	(67)
把革命精神与科学态度结合起来	(80)
让我们来个读书比赛	(89)
要尊重唯物论、尊重辩证法	(108)
毛主席畅谈“四面八方”	(126)
毛主席支持山西创办农业合作社	(132)
毛主席与农业学大寨	(161)
我记忆中的毛泽东同志	
——为纪念毛泽东诞辰 100 周年而作	(177)
《一个省委书记回忆毛主席》序	(195)
后记	(197)

毛主席说：省委第一书记不要光搞实际，九分搞实际，有一分还要搞理论嘛；我们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左”，也反对右；要警惕干部生活上的特殊化、贵族化；在党内的路线斗争中，应当表示态度，应当坚持原则；要反对官气，这对中央和省市自治区两级领导同志来说，尤其重要；教育干部是一个战略问题，省委第一书记要亲自抓；省级报纸也要认真办好，关键是第一书记挂帅；开会要注意抓思想动向；对犯错误者的态度和方法是：第一条保护他，第二条批评他；一个人受到冤屈，……要相信我们的党是掌握真理的党，是实事求是的党。

毛主席教我们当省委书记

从1953年1月我被任命为中共山西省委书记，1953年7月根据中央决定改称省委第一书记，到1965年8月我奉命调离山西，先后12年零8个月，是我一生中在毛主席直接教诲下渡过的最难忘怀的岁月。毛主席是怎样教诲我们这一代省委第一书记的？这是我每当回忆辞去的岁月时都在反复思索的课题。我曾写过的几篇回忆文章，例如《毛主席教我们读书》、《毛主席谈辩证法》等，都同毛主席教我们当省委书记这个主题

直接相关，但它们都欠全面。毛主席为了教我们当好省委书记，倾注了那么多的心血，寄予了那么多的厚望，这笔珍贵的精神遗产，我们是决不能忘怀的。现在，我重新翻阅那 12 年间的现场笔录，并围绕这个主题，从中归纳成为 12 个要点，分述如下。

省委第一书记要抓理论工作

1956 年 11 月毛主席在八届二中全会上说，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后马克思主义理论衰退了。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夺取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我们说，列宁主义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哪些地方发展了呢？一，在世界观即唯物论和辩证法方面发展了它；二，在革命的理论、革命的策略方面，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政党等问题上发展了它。列宁还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学说，从 1917 年十月革命开始，革命中间就有建设，他已经有了七年的实践。这是马克思所没有的。我们学的就是这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我们的群众路线也是从十月革命学来的。可是现在他们不要了。省委第一书记不要光搞实际，九分搞实际，有一分还要搞理论嘛！实际固然要，理论更重要。他们抛弃了列宁主义学说，我们中国要捍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

1957 年 1 月毛主席在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上说：官做大了也可以利令智昏。当了第一书记（指赫鲁晓夫），也是一种利，也容易使人头脑发昏。周恩来同志率领代表团到苏联去，我在电话里就跟他说，这些人利令智昏，对他们的办

法，最好是臭骂一顿。什么叫利呢？无非是五千万吨钢，四亿吨煤，八千万吨石油。这算什么？这叫不算数！看见这么一点东西，就居然胀满了一脑壳。这叫什么共产党员，什么马克思主义者！我说再加十倍、一百倍，也不算数。你无非是在地球上挖了那么一点东西，变成钢材，做成汽车飞机之类，这有什么了不起。可是你把它当作那么大的包袱背在背上，什么革命原则都不顾了。这还不叫利令智昏。

毛主席的这一段话，也给我们当省委第一书记的敲了一下警钟。如果你工作有了成绩就骄傲起来，就翘尾巴，你总有一天也会像赫鲁晓夫一样利令智昏的。

毛主席还说，苏共“二十大”一来，从前拥护斯大林非常积极的人，这时候也反得非常积极。我看这些人不讲马克思列宁主义，对问题不作分析，也缺乏革命道德。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包括无产阶级的革命道德。你从前那么拥护斯大林，现在总要讲一点理由，才能转过弯来吧。理由一点不讲，忽然转那么一百八十度，好像老子从来就是不拥护斯大林的，其实从前是非常拥护的。这就是不道德嘛！

毛主席的这一段话，对全世界所有头脑发昏的共产党人是一副很好的清醒剂。

苏共“二十大”之后，在我们国内，资产阶级右派在国际现代修正主义的影响下，向工人阶级和共产党进行猖狂的进攻。我们党在毛主席的领导下，采取整风的方式，展开了一场震惊中外的反右派的伟大斗争。毛主席在1957年7月青岛会议上，号召到会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必须把这场伟大斗争完全掌握起来。必须把民主党派（政治界），教育界，新闻界，

科技界，文艺界，卫生界，工商界的政治改造工作和思想改造工作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各省、市、自治区要有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自己的科学家和技术人才，自己的文学家、艺术家和文艺理论家，要有自己的出色的报纸和刊物的编辑和记者。毛主席就是这样教我们省委第一书记在思想工作和理论上，要有如此大的气魄，要看得见，抓得起。

实际上，半年之前，即在1957年1月那次会议上，毛主席鉴于苏共“二十大”以后国际国内的新情况，就曾明确指出，全党都要注意思想理论工作，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学说，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新问题，观察和处理国际斗争中的新问题。

“在路线问题上要戒‘左’戒右”

1956年10月在党的七届六中全会上，毛主席在谈到反对右倾保守问题时说：过去一个时期，我们曾经较多的反对急躁冒进。这有好的一面，但也有坏的一面，这就是把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反掉了。结果，正气受压，邪气上升，右倾保守思想多了。我们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有几条路线可走，但我们可以选择其中一条比较合理的路线，和群众在一起，站在群众前头，鼓舞群众前进，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较大的成果。这是正确的路线。另一条路线，照常规办事，按照老样子走路，结果思想落后于实际，群众没有劲，这是错误的路线，我们叫它保守主义。人总是惯于按照老习惯想问题，但共产党员就要有打

破常规的勇气。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有正确的领导方法。有两种领导方法：一种是，全面规划，接近群众，走群众路线的方法。用这种方法来发现问题，发现先进经验，发现新生事物，创造和发展新的生产力。用积极的东西、先进的东西，克服消极的东西、落后的东西，用正气压倒邪气。怎样发现先进经验呢？一句话，用解剖麻雀的方法。所谓解剖麻雀并不需要把所有的麻雀统统捉来解剖，然后才证明“麻雀虽小肝胆俱全”。从来的科学家都不是这么干的。只要把几个麻雀解剖清楚了，就可以作出适当的结论。这就是从个别中就可以看出有普遍意义的东西——先进经验。

总之，要抓先进经验，并且要推广先进经验，也叫做抓典型。这是政治问题，也是领导方法问题。要抓先进经验，就要研究它为什么先进；要推广先进经验，就要研究落后的为什么落后。这样就可以取得比较全面的知识，取得指导全盘工作的发言权。

另一种领导方法，就是坐在办公室写公文，办公事，不发现问题，不解决问题，这在中央有，各省市自治区也有。天天办一堆一堆的公事，并不等于解决重大问题。各省市自治区几个书记，一年之内，总要轮流不在办公室办公事，下去看看，否则就要“感冒”。下去时，先进的、中间的、落后的三种类型的都要看，最好要蹲点，并且要和群众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

“在路线问题上要戒‘左’戒右”。这是毛主席在1955年3月全国党代表会议上说的。他说，什么叫“左”？超过时代，超过当前的情况，在方针政策上，在行动上冒进，在斗争的问题

上，在发生争论的问题上乱斗，这是“左”。这个不好。落在时代的后面，落在当前情况的后面，缺乏斗争性，这是右。这个也不好。我们党内有喜欢“左”的，也有喜欢右的，或者喜欢中间偏右，这都是不好的。我们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左”，也反对右。

这里，我想起了一个最明显的例证。1953年全国财经工作会议期间，党内对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理解存在不一致的情况。有一种观点认为过渡时期要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毛主席批评说，你不能确立这个秩序，因为每日每时都在增长着社会主义因素。你要确立这个秩序，就势必阻碍社会主义因素的增长，就过渡不到社会主义了。另一种观点，认为过渡时期是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毛主席说这个提法，缺点是不明确。仔细分析就有毛病。好像现在还不是社会主义，不知到什么时候，忽然有一天才是社会主义，实际上不是的。我们的提法是“逐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因为是逐步，可以反“左”；因为要过渡，又可反右。所以这个提法完全符合两条战线斗争的原则。历来的经验证明，在反对党内错误倾向的斗争中，往往容易由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所以毛主席总是提醒全党，在反对一种主要错误倾向时，要注意防止掩盖着的另一种错误倾向。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更不要用一种倾向反对另一种倾向。总之，要注意两条战线的斗争。

“一定要防止特殊化、贵族化”

1956年11月毛主席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说：

鉴于国际教训，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人有很多特殊权利，可能形成特殊阶层而脱离群众。列宁说过，英国工人中有一部分成为贵族工人，离开了工人党，离开了工人群众，成为社会沙文主义。社会主义国家如果出现特殊阶层，那就和英国的贵族工人一样，也将成为社会沙文主义，因而就将产生大国主义（对外）、大民族主义（对少数民族）、专制主义（对人民群众）的错误。在我国也有可能出现新贵族。所以要警惕干部生活上的特殊化、贵族化。县委以上全国有几十万人，一定要防止特殊化、贵族化。

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困难的时候，各级领导同志同群众生活的距离越短越好。要勤俭建国，反对铺张浪费，提倡艰苦朴素，提倡同人民同甘共苦。特别是新工业区的领导干部，必须有与群众同甘共苦的作风。学生、工人住大楼，领导干部住草棚，这是对付学生、工人上大街闹事的好办法。同人民有福同享，有祸同当，这是我们过去干过的，为什么现在不能干呢？只要我们这样干了，就不会脱离群众。

当解放军有的领导同志提出在和平时期逐渐缩小军队内部上下之间的待遇差别和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之间的待遇差别的建议时，毛主席说：我赞成这样做，但不要搞绝对平均主义。他还用强调的语气说，我是历来主张解放军要艰苦奋斗，要成为模范的。军队这样，地方的“文官”就更要艰苦奋斗，否则，军队就要将你的军。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艰苦奋斗是我们取得人心的政治资本。39年前毛主席说的这句话，我认为现在仍然应该成为省委第一书记和各级领导干部的座右铭。

在这次会议上，毛主席还说，各级党委要抓报纸。过去一

个时期，报纸上片面地、不切合实际地宣传改善人民生活，而对勤俭建国、反对铺张浪费，提倡艰苦朴素，与人民同甘共苦这些东西很少宣传。以后报纸宣传的重点要放到这方面来。

对原则性问题要有明确态度

在1955年3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有些高级干部对高饶反党联盟的活动有所知情但态度沉默。毛主席讲话时，对他们不指名地批评说：在党内的路线斗争中，应当表示态度，应当坚持原则。有些同志头上没有长角，有些同志头上长了角但不尖锐，缺乏斗争性。牛长了两个角是为了斗争。有些同志在原则性的问题上，不表示意见，不批评，批评也不尖锐，是害怕同志间不好相处，害怕丧失选举票。为什么坐在凳子上不发言，凳子也还要有折旧费嘛！害怕丧失选举票，恰恰丧失了共产党员的品质。在原则性的问题上，在同志之间，对于违反党的原则的言论、行动，应当保持一个距离。就是说，要划清界限，立即挡回去，不能因为老朋友，老上司，老部下，老同事，同学，同乡等而废除这个距离。

毛主席在1954年一次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上说：你要批评一个人，你是有这个权利的，但要有勇气反对你所认为不正确的事。当然要采取合法的方式。批评时，首先要表明自己的态度：我支持你、拥护你，与你合作，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严厉的批评。这样，先取得批评的资格，才能使批评的结果不致引起对立。现在有的人采取要么就不批评，要么一批评就对立起来。这两种情况都是要不得的。不批评对党不利，还

是要批评的。有些人光摸别人的老虎屁股，而怕别人摸自己的老虎屁股。在这种人面前不要唯唯诺诺，要有勇气反潮流。紧急的时候，要明确表示自己的政治态度。

毛主席还说：批评要不问对象、不顾情面、大公无私。对事不对人的说法，不对。这是绅士的口号。对事也要对人。对敌对的坏人坏事就要进行无情的斗争。否则，即敌我不分。党内问题，则应采取诚恳坦率的方式，进行同志式的帮助。有些同志在这个界限上很模糊。同志间批评一次就是最珍贵的帮助。只有共产党才能做到这一点。

1958年3月22日，毛主席在成都会议上针对党内有一种不敢讲真心话的情况，说：有的同志有这样一种处世哲学，“逢人只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这就说明他头上没有长角，因而没有斗争性。不敢讲真心话，无非有六怕，即：一怕被封为机会主义，二怕撤职，三怕开除党籍，四怕老婆离婚，五怕坐牢，六怕杀头。只要准备最后一条——杀头，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当然我们要造成一种环境使人不恐惧，所以我们提倡开会实行“三不主义”，即：不戴帽子，不抓辫子，不打棍子。对于真正的先进分子来说，为着坚持真理，就不应怕这一套，就应该有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气概。

“不是书记一个人说了算”

1962年1月，在北京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毛主席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深刻地阐述了党的民主集中制问题。他说：我们党实行的民主集中制，不是书记一个人说了算，而是少数